

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称：

## 日本年轻人集体“向下流动”

本报记者 邢晓婧

## “单身寄生族”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鲁迅的这句名言被印在《为避免下坠而竞争》的封底上，日本至今仍面临鲁迅这句近百年前发出的追问。中产阶级会重新坠入生活困顿的社会底层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为避免下坠而竞争”？山田昌弘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称，以家庭为单位来看的话，父母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好，子女则希望能过上至少不输于父辈的生活。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父辈（1960年以前出生）恰逢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高收入、有资产，退休金相对丰厚，跻身中产阶级。与此相对，年轻一代（1970年以后出生）毕业时，工作机会减少、收入水平降低，他们父母一代获取的中产阶级身份难以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延续。

山田昌弘介绍称，日本有很多低收入群体至今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年龄从20岁跨至50岁。只要父母在世，这些“孩子”即使不婚、不育、不工作，也能生活下去，被诟病为“单身寄生族”。新闻上也曾爆出为冒领退休金，故意隐瞒父母死讯的诈骗事件。

日本年轻人的职场和收入状况直接影响他们的婚育观念。山田昌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没有稳定工作、收入低的男性难以得到女性青睐，只有年收入300万至400万日元（约合16.5万至22万元人民币）才能拿到婚恋市场入场券，这令很多男性望而却步，索性放弃婚育。高收入女性在没有遇到合适结婚对象的情况下宁愿选择单身，勉强结婚的女性婚后倾向回归家庭。不过，由于男性收入减少，女性婚后无法安心当家庭主妇，需要在超市、便利店等场所从事收银、清扫等体力劳动补贴家用。山田昌弘说，“这种工作很难获得满足感，欧美国家靠移民来做，日本则是年轻人在做。”

## 他们失去“向上的憧憬”

在采访中山田昌弘提到，相比于欧

美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东亚国家属于“年轻时不努力向上，之后便难以挽回”的社会。山田认为，总体而言，对于男性来说，考上什么层次的大学决定毕业进入什么层次的公司，也决定将来生活的层次；对于女性来说，与什么层次的男性结婚，决定将来生活的层次。这两条路径是防止“阶层下坠”的重要机会。

残酷的是，日本大学升学率约为50%，考上名牌大学的更是凤毛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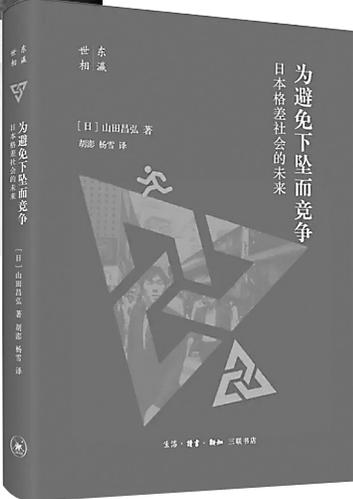


角。在学历至上的日本社会，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难以生存，索性自暴自弃、彻底躺平。那些在这场“为了防止下坠而竞争”中的获胜者，他们以学历为敲门砖找到稳定的工作，从此失去“向上的憧憬”，想要安稳度日的愿望十分强烈。

从“战后奇迹”到“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当今日本年轻人初出校门便进入低薪资、低成就、低晋升机会的劳动环境。他们有的选择不婚、不育、不工作、不出门，甚至缩回年迈的父母身边甘做“单身寄生族”。失衡的人口结构对日本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内阁府民间议员、中央大学教授山田昌弘在新著《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如图）中，从家庭社会学角度剖析日本年轻人为何陷入集体“向下流动”的险境。山田昌弘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同为亚洲国家的中韩等国同样面临因少子老龄化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日本的解决方案和经验教训或许可供中韩参考借鉴。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1989年全球大企业股价排名50强中，日本企业占据32席甚至包揽前五；而在2018年榜单中，仅剩丰田汽车一家日本企业独撑门面。

如今日本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正是对这一榜单变化的合理解释。“不敢冒险！”山田昌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年轻人进入公司以后，为了稳妥起见，事事服从安排，缺少创新。没有创新的社会怎么会有全球领先的企业？何况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工



作，就靠父母养着。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虽然经济衰退，但犯罪率也随之减少，特别是少有年轻人犯罪的情况。他解释称，有欲望才会想要去获取什么，什么都不想要的人自然不会犯罪。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日本年轻人的“无欲望”。

那些日本年轻人担心自己的未来吗？山田昌弘给出的回答相当简单——他们根本不会去想未来。

## 如何让年轻人看到希望？

长此以往，日本是否会成为第一个大量国民“集体下坠”的发达国家？“不是下坠，是在不知不觉中缓缓衰退。”山田昌弘认为，“下坠”是突然“从高到低”，日本的情况好比“温水煮青蛙”，最危险的是变化一点点发生，日本人会在毫无察觉中变穷。

山田昌弘在书中写道：当前的日本年轻人没有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但已失去“向上生长”的动力和愿望。“这些年轻人没有未来，”他对《环球时报》记者坦言称，现存问题恐在20年后迎来集中暴发，难以想象那时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想必这群“孩子”年事已高，没有工作，大概率依靠父母存款过活，陷入真正的困境，阶层“向下流动”势不可挡。

山田昌弘尝试给出对策，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在职场上，打破固有的年功序列制度下的薪资体系，让年轻人有晋升到管理层的可能性；在婚育方面，摆脱父母与子女深度绑定的寄生文化，为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做准备。整个社会，应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充满希望的环境。

山田昌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所遇到的问题有可能在30年至50年后在中韩等国上演，日本的解决方案和经验教训或许可供中韩参考借鉴。▲



## 影视配乐，不甘当配角

本报记者 张雪婷

优秀的影视剧音乐，往往会成为影视作品的“代言”。比如一谈起《星球大战》《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加勒比海盗》等经典电影，很多人耳边就会响起各自的主题配乐。近日，国产动画黑马《雄狮少年》点燃互联网舆论，背景音乐也成为舆论关注的重点——电影中不断演奏的本土化插曲，将故事的“广味小镇”衬托得更加有滋有味。其实不只是《雄狮少年》，近些年国产影视剧产出一批优质的“音乐副产品”。有业内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正是中国影视行业更成熟、更多元的表现。

“首先能想起来的就《西游记》主题曲”“对老电影比较有印象，比如《地道战》”“《激情燃烧的岁月》用一个旋律演绎整个作品，最令人难忘”……《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不同年龄段观众印象最深

的国产影视剧音乐时，不少人称，“抓耳”的配乐，往往附属于那些本身口碑就很好的影视作品。音乐监制、影视配乐师梁潇（艺名“潇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以《甄嬛传》为例，主题曲《红颜劫》及其多首变奏，安陵容唱的《采莲曲》，以及悲剧剧情或妃嫔陨落时常用的女声哼唱曲《长夜孤枕》《女儿泪涟》等都能被人记住，这与该剧高口碑有很大关系。在网络上，《甄嬛传》粉丝剪辑视频长盛不衰，也反复加强观众们的记忆点。另一个例子则是，日本影视音乐大师久石让为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2007年）创作的同名主题音乐，该配乐“出圈”是它在《让子弹飞》（2010年）中再度响起之时。“观众们能记住这样一个经典、有力量的曲子，也侧面反映出大家的审美和音乐教育有所提升。”

此前有观点称，国产影视音乐制作过于“套路化”，且很少有“抓耳”的旋律。实际上，对于影视音乐是否应“抓耳”，很早就存在争议。赞同者认为配乐应让观众印象深刻，“这首曲子就是这部电影的代表”；另一种声音则认为配乐应服务于剧情，“最好让观众无意识地融入作品中，音乐本身不要太过突出”。对此，梁潇认为，是否“抓耳”需要看导演的意图和音乐的功能性，“很多导演是不希望音乐抢戏剧情的”。她介绍称，音乐制作更偏音效化，是如今该行业的大趋势。如好莱坞科幻大片《沙丘》和国产悬疑剧集《隐秘的角落》，就大胆地把一些生活或想象中的音效放到配乐中，更能还原剧情氛围。同时，音乐还会与影视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更紧密结合。梁潇担任音乐监制的国产动画剧集《一人之下4》中，就有多首配乐采用贵

州少数民族如苗族、侗族大歌等元素。

梁潇认为，音乐显得“套路化”，其实也是影视多元化的正面效应。“主题旋律能否耳熟能详，这很难预测。因为观众现在接触到的国内外影视剧太多、太广，几个月后还能常听同一首歌曲的情形越来越少。”

当然，影视音乐能否令人印象深刻并“出圈”，也存在一定运气成分。在好莱坞和日本，影视音乐领域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如大名鼎鼎的配乐大师汉斯·季默本人只负责旋律创作，他的音乐团队则承担配器、音乐工程、出谱、混音、音乐编辑等不同分工，这种模式能把团队的个人优势和整体制作效率最大化。相比之下，国内作曲家大都身兼数职，这与行业并未完全成熟、专业人才仍然缺乏有关。不过，随着近些年国产影视作品多样化，相关音乐也更加多样性，配乐师们正尝试从“套路”中寻求创新。一些配乐师会融入不同曲风，比如把电声融进管弦乐，或融入更多民族乐器。

“国内配乐师越来越多，这个职业已朝着正规化发展，比10年前专业了很多。”梁潇介绍说，很多国内配乐从业者都受过影视和音乐双系统训练，在大学阶段，影视配乐专业课程也越来越受欢迎。▲